評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 (1550 ~ 1850)》*

謝美娥、江長青、何淑宜**

書 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 (1550 ~ 1850)

作 者：李伯重

出版地點：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頁 數：589 頁

一、前 言

自 1950 年代開始，環繞著明清以來中國是否歷經現代化、工業化（以西方學者為主）、是否進入資本主義階段（以中國大陸學者為主）的議題，曾經成為備受矚目研究的焦點。但在這些討論逐漸沈寂之後，隨著「原始工業化」理論的提出和應用，工業化課題再度以新的討論框架被納入，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 (1550 ~ 1850)》一書也因此特別值得重視。近年來，許多中國大陸學者已漸漸嘗試突破舊理論框架的限制（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階段發展論），本書也充分反映出這一趨勢。對此，宋立中、范金民給予相當不錯的評價，並對李氏取得的成就讚譽有加，包括：多種理論的應用、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舊研究模式的擺脫等方面，而且對本書中更為細部的史料舉證、推論、以及假設性的江南工業「前

* 本文承蒙林麗月、林森祿、邱澎生三位教授與鄭永昌先生，以及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景」的議題，宋、范二人也有極為精彩的申論，值得參考。¹

不過，本書令人印象最深刻的部份，應該在於以工業化的探討為主線，嘗試以新理論回答舊問題。這關涉到如何理解理論、是否進一步實證、是否以實證結果回應原來的理論等種種面向。然而，宋、范二人對這方面的討論並不足夠。本文將以此點出發，進一步接著深入討論，特別是書中著意引用的「早期工業化」問題。此外，對於本書部份內容概念的推導、經濟部門的分劃等，本文也將試加補充。

二、內容簡介

本書為作者對 1850 年以前江南工業的發展所進行的考察，全書針對各工業部門的商業化、專業化、生產規模、生產組織、生產技術等議題，展開討論，接著探討江南工業發展的能源、材料等物質環境的決定性因素與勞動力供需，以及因此產生何種發展特點。最後，進一步反省「資本主義萌芽」的理論瓶頸，以期建立明清時期江南工業發展研究的新模式。全書章節如下：

第一章 導論——本書題解

第二章 輕工業(一)：紡織業

第三章 輕工業(二)：食品業

第四章 輕工業(三)：服裝製作業、日用百貨製造業、煙草加工業、造紙業與印刷業

第五章 重工業(一)：工具製造業與建材工業

第六章 重工業(二)：造船業（附修船業）

第七章 江南早期工業化中的能源與材料問題

第八章 江南早期工業化中的原料輸入與產品輸出問題

第九章 江南早期工業化中的人力資源問題

第十章 節能省材型發展：明清江南工業發展的主要特點

第十一章 代結論——資本主義近代工業化：明清江南工業的發展前景？

1 宋立中、范金民，〈理論與實證相結合的一部力作——評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新史學》，第12卷第4期（2001年12月），頁193-205。

茲將以上十一章分為早期工業化理論、輕重工業、能源與材料、市場、人力資源、超輕結構與前景等七項子題述介如下：

（一）「早期工業化」理論

本書為作者累積有關明清江南經濟的長期研究後完成的力作。在質疑以西方模式為普世規則的研究路徑是否正確的風氣下，如何重新檢視明清時期經濟發展的情況，是作者研究的重點。本書大量吸收西方關於工業發展階段的研究，提出以「早期工業化」的概念，取代「資本主義萌芽論」，做為研究明清時期江南工業發展的理論基礎。

歐美學界關於工業化產生的原因與階段眾說紛紜，在對近代早期以來歐洲工業化階段的劃分中，由於農村手工業的發展逐漸被視為影響近代工業化的關鍵因素，因而也成為晚近歐洲經濟史研究的重點。其中「原始工業化 (Proto-industrialization)」概念的提出，成為解釋近代早期歐洲農村工業化的重要理論。這一理論由 Franklin F. Mendels² 在 1972 年提出，用以指稱工業革命以前的近代早期歐洲的經濟發展。它包括下列特徵：1. 以面向本地區以外的生產為條件；2. 是利用農村農閒勞動力的農村工業；3. 原始工業化興起時，該地區的商業化農業已經發達，勞動者同時由工業與農業中獲得收入。在此定義下，有五個可能的發展假設：1. 將導致結婚年齡下降，促進人口增長，增加勞動力供給；2. 商人將農村勞動產品送到城市進行加工，使得城鄉經濟關係更為緊密；3. 原始工業化所產生的利潤成為工業生產中機器投資的資本來源；4. 原始工業化教會商人與勞動者相關技能；5. 原始工業化為資本主義農業奠定基礎。因而原始工業化與近代工業化之間產生必然的因果關係。（頁 8、9）

由於「原始工業化」的概念強調農村工業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並適用於歐洲以外的地區，因此印度、日本的學者紛紛以之為研究當地經濟發展的參照模式。但對於此一模式是否適用於研究中國的情況，作者持否定的立場。他認為「原始工業化」理論強調原始工業化與近代工業化的因果關係，並不盡然符合歷史事實，加以這一理論過分強調農村工業的作用，也忽視城鎮工業的發展及其與

2 李著中 Mendels（頁 6、9、10、582）應更正為 Mendels。

農村工業的關係，（頁11）因此，作者主張代之以「早期工業化」的觀念。

「早期工業化」一詞語出 Phyllis Deane³ 對工業革命前英國工業發展的研究。Deane 認為早期工業化與近代工業化有二項差異：1. 早期工業化只影響到範圍有限的國內工業部門，而且只出現很少的技術突破；2. 農業產量、國內交通與國際貿易並未與早期工業化同時並進。（頁13）針對 Deane 早期工業化的說法，本書作者李伯重主張應該加入另一項特徵，亦即將農村工業也納入國內工業部門。如此一來，早期工業化是近代工業化之前的一個歷史階段，即使前者為後者創造許多必要條件，但由於二者本質的差異，早期工業化並不必然導致近代工業化。（頁13）作者認為中國明清時期的經濟發展，也與此一概念有相合之處。然而過去在「資本主義萌芽」脈絡下所進行的研究，由於理論框架的限制，往往未能擺脫以西歐發展模式研究中國的缺陷，加以過分注重生產關係的發展，忽視了對諸如經濟成長方式、輕重工業的比例等的討論，而且對工業所賴以形成的物質條件研究不足，同時又只注意一些主要部門，如紡織業，而忽視其他部門的研究，在諸般問題下，作者指出，「早期工業化」的概念正可補足這些缺點。

以此一觀念研究近代早期中國的經濟發展，首先必須注意的是地區性的問題，而作者認為明清時期江南的工業發展，顯然在中國經濟史中居於特殊而中心的位置。江南八府一州由太湖與運河水路構成一完整的經濟區，而此地早期工業化的發展，與該區的農、商、其他產業關係極為密切，形成此區發展的優勢。另外，關於江南早期工業化的起迄時間，作者認為應是自明代中期（1550年）到太平天國前夕（1850年）為止。⁴ 同時，在此一時段內研究江南的工業發展，另外必須注意到所謂「從事消費資料生產的工業」與「從事生產資料生產的工業」之間的分工問題，但為便於瞭解，作者分別以輕、重工業的名稱代之，進行討論。

3 本書將 Phyllis Deane 誤植為 Philis Dean、Philips Dean（頁456、580）。

4 作者認為以明代中期為研究的起點，主要是因為早期工業化要討論的是，整個工業的發展在經濟中所佔地位的日益重要。以此衡量，依據學者的研究，明代中期是江南經濟加速成長的時期，其中工業成長具有最重要的地位，所以，以此為早期工業化的起點。而討論的斷限止於1850年，一方面由於太平天國的發生，使得江南經濟受到空前的破壞；另外則因為19世紀中期自強運動時期模仿西方所建立的工業，已屬近代工業性質，因此，宜將兩者加以區別。見本書頁23-24。

(二)以輕重工業為對象的觀察

自第二章起至第六章，分為輕工業與重工業兩大項。李著本書是為證明在江南工業化的過程中，不僅只有量的增長，也發生質的改變，由此五章之安排，關照層面甚為廣闊，可見作者欲說明所謂質的改變是全面性而非部分的現象。

總體而言，在對輕工業的討論中，生產規模的擴大、生產技術的進步、分工與專業化的加強與生產組織的變化，以及產品商業化的現象是作者考察的重點。這幾項議題在第二章「輕工業(一)：紡織業」有所論列，但對這些議題的普遍關心，仍可由第三章與第四章的閱讀中得知，儘管這兩章的安排方式是根據業別而不是議題。第二章旨在說明此時期的紡織業在生產的「質」方面，也發生重要的變化，並非只在「量」上有所變化而已。就生產規模而言，自明代後期至清代中期，產量約擴大了一倍；生產技術方面，棉紡織業從織機、壓車與紡車三種工具的改進說明，絲織業則以花機的改進來表現。而在棉、絲紡織業的生產工藝上，從染色技術與品種的增加方面亦可見提高；另外，由兩種情況可以看出在分工與專業化方面的加強，一是棉、絲紡織業均發生工序分離，另一是原本附屬於農村的副業走向城鎮專業。在生產規模方面，絲織業中的帳房制度仍支配生產，並可能成為手工業工場無法發展的原因。在較大城鎮的棉紡織業中，清代可能已為商人所控制。

第三章為食品業，依章節分為穀物加工、釀酒與製麪、製茶、食品再加工、製鹽與榨油等業。其中穀物加工業又分為碾米業與磨麵業，食品加工業又分為糖果糕點製作業與副食品加工業（內含水產品加工、禽類加工、肉類加工、乳品加工與果品加工）。在生產規模方面，各業在明清時期均已顯著擴大，且發展成分布廣泛，從業人員眾多的城鎮工業。製茶業發展成為山區工業，而製鹽業則成為唯一生產規模縮小的工業。在各業中，商品化的程度也有所提高，生產技術也有改進，明清時代絕非技術停滯的時代。

第四章則一併檢討了服裝製作業、日用百貨製造業、煙草加工業、造紙業與印刷業。其中，服裝製作業再細分為成衣業、製帽業與製鞋襪業；日用百貨業再細分為草編業（含竹藤棕編）、製燭、製扇、文具製作等業。各業的商品化、專業化以及生產規模擴大的程度是本書的焦點所在，作者指出，各業自明末至清代

均有長足的進步。在印刷業方面，作者注意的變化有三，一為私營印刷業在本時期的大幅成長；二為技術的進步，鉛活字在明末的首次運用，並出現諸家印書專家如華燧等；另一則為商業化印刷物的發展，如通俗文藝讀物、通俗實用讀物、時文選本與文士詩文、年畫、日曆與宗教信仰用品等，高度的商業化與平民取向是其特點。

作者將重工業分為兩章討論，第五章為「工具製造業與建材工業」。在討論工具製造業中：鐵工具的考察重點為生產規模的擴大、生產技術的改進、企業規模的擴大與生產組織的改進；木工具分為農具與棉紡織機具、絲紡織機具，並就它們的專業化、商業化與生產規模的問題進行探討；陶工具的關注焦點同樣也在於商業化、專業化與製作技術的改進。而在建材工業方面，再細分為磚瓦、石灰燒製與石料採取三種行業，明清時期生產技術的改進與生產規模的擴大是討論的重點。作者的結論認為，至清代中期由於生產落後於需求，因此建材價格日昂。簡言之，經由作者的論證，從明末到清代中期，工具業與建材業中，無論各業均呈現商品商業化、製作技術進步、生產規模擴大與專業化的趨向。

造船業是技術最先進、資本投入最密集，也是企業規模最大的部門。依照作者的看法，造船業是近代以前最重要的重工業部門之一，因此作者另闢一章詳加討論。在本書關於重工業的另一項目，即第六章「重工業(二)：造船業(附修船業)」中，關注的問題與作者所得結論大致有五：在船隻的種類及數量方面，農船、漁船與內河船的數量均有增加，漕船的數量減少，海船在數量與運量上均有增加；在每年造船數量方面，作者推估，自明末至清道光初年，每年造漕船數減少，造海船數量則增加；就每年修船數量而言，從維修期限、維修費用與維修人員三方面來看，清代規模較之明代均有擴大；造船業年產值方面，透過漕船與海船造船總數與造船單價的推估得知，清初較明末均有增加；在從業人數方面，據李昭祥的《龍江船廠志》推估，造船業到清代由於體積擴大，從業人員也隨之增加。而民間造船業的成長是本時期值得注意的現象；在說明造船企業內部的分工、協作與資本積聚方面，則以大型造船廠的出現，與專業化分工的細膩程度為指標。

（三）能源與材料問題

本章藉由工業發展過程中必不可少的能源與材料問題，討論影響江南地區工業發展的物質環境因素。作者認為就能源而言，近代以前工業發展主要仰賴可再生能源，諸如動力上的水力、風力、畜力、人力；燃料上的木材等。到近代早期，不可再生能源（例如煤）才日漸重要。由於自然條件的限制，明清時期江南的風力、水力、畜力均非主要動力，而人力則佔有絕大的比重。在燃料上，由於薪炭自南宋以後的嚴重消耗，加以江南產煤少，又因運輸成本高，難以由外地輸入等因素，使得江南的燃料供應，只能支持低能耗的生產。

至於工業所需的材料部份，作者舉鐵與木材為例，分別就消費與供給兩方面加以討論。就鐵而言，江南的造船業、鐵鍋製作業、建築業均需要大量的鐵，但由於本地不產鐵，江南鐵資源多由閩、廣、湘等地輸入，但因距離遙遠，運費高昂，因此鐵價居高不下。木材部份也有類似問題。江南木材主要仰賴外地輸入，包括鄰近地區、福建、長江中游、長江上游等地。但木材資源的逐漸耗竭與成本因素，也使得木材價格昂貴，無法有效供應。

（四）市場：原料輸入與產品輸出

市場在「早期工業化」理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作者在這一部份討論與原料輸入及產品輸出相關的市場問題。整體而言，明清時期，江南工業對外地原料與產品市場的依賴極深。在原料部份，舉凡碾米業所需的稻穀、榨油業的大豆、紡織業的棉花、染料，以及蔗糖、紙張、有色金屬等，均需由外地輸入。在產品部份，江南製作出的紡織品，如棉布、絲織品，及書籍等，由明代中葉到清代向外地市場輸出量更是急遽增加。作者舉棉布為例，明代江南棉布已銷售全國，即使清代以後受華北棉布的打擊，但隨著全國棉布市場總規模的擴大，與海外市場的開拓，江南棉布的實際輸出規模並未縮小，且有逐漸轉向較高等級市場的傾向。絲織品的情況亦雷同。

因此，就江南工業所需的原料而言，輕工業原料基本上都可透過市場，由輸入獲得，且顯然較重工業原料的取得容易。同時，江南的產品也擁有全國與海外廣大的市場。江南的工業即在全國市場擴大、區域分工與生產專業化形成的基礎上，逐步發展。只是作者仍提醒不可將海外市場的擴大過度理想化，因為此一時期

期海外市場擴展的盈餘並未能轉變成工業所需的煤鐵，因而對江南工業的發展起了消極的影響。

田人力資源

討論經濟發展歷程，不能不考慮到人口變數。然而對於以往耳熟能詳的主流看法，諸如：明清江南人口的增長已經出現「人口爆炸」或「人口危機」，明清江南工業的發展乃是對人口壓力的一種反應，勞動力供過於求引起生產「過密化」、勞動生產率降低和勞動素質低落等等，作者有不同的意見。在第九章中，他針對這些看法提出反駁，認為明清江南人口的增長速度「並非過快」，並未導致人口壓力的出現，也未出現生產率下降和勞動素質落後的情形，更遑論阻礙經濟發展。

作者推估，清中期的江南人口與全國相較，人口成長率低於全國人口成長率；與英國相較，1620至1850年間江南歷經2.5個世紀，人口只增加了80%，而1751至1851年英國人口卻增加了160%。據此，作者認為江南沒有出現「人口爆炸」現象。作者又估計1620至1850年間城鎮和農村工業勞動力的增加，認為城鎮勞動力的增加，主要不是來自城鎮附近的農村，而是來自城鎮以外地區。這是因為江南經常存在「近鎮人家多業機杼，間有業田者」的情形，靠近城鎮地區的農村多半已經成為工業從業者。而且江南無法推行勞動更為密集的雙季稻、甘薯、水稻區種法等農制；使用短工增加；1850年以前少有大量人口移出等等，都是農村沒有過剩勞動力可運用於工業部門的跡象。綜言之，作者認為江南城鄉工業勞動力已經供給不足，人口壓力阻礙經濟發展之說，完全不能自圓。

至此，作者所描繪的是一個人口沒有出現過度增長、勞動力沒有供過於求的江南。然而在本土勞動供給彈性不大的狀態下，究竟可以透過怎樣的管道，才能促使江南擁有高度專業化、面向市場的生產趨勢？作者提供的思考方向在於人力資源素質的提高。他認為明後期江南漸由滿足自家消費、由欠熟練的人工操作、農閒時進行的副業，轉為面向市場、以熟練的技能操作、生產專業化與家內耕織分工的生產。從欠熟練到熟練，繫於兩方面的普及：一是江南的紡織技能無不經由4至6年長時期的職業培訓而成，另一是文化教育的效果，即下層社會的識字教育（村塾啓蒙教育）和學徒式的數學教育。這兩方面的普及，對小作坊所需的

基本讀寫算能力有所增進，而中大型工業中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力，也都是受益者。

六「節能省材」型的「超輕」結構

第十章可視為作者充分討論江南早期工業化時期各分項要素之後，歸納出的結論。避開以往著重生產關係的論述，他以工業結構為主線，提出所謂「節能省材型」的「超輕結構」說。一般認為，工業結構的變革是工業革命的諸多變革之一，即重工業比重在工業部門之中愈為重要，西方中世紀後期以來的工業發展，就是逐漸呈現這個趨勢。作者以近代早期英國為參照，認為若當時英國重工業比重尚小，屬於「輕型結構」的話，那麼明清江南重工業比重反而隨著輕工業的迅速發展而不斷下降的趨勢，當屬「超輕結構」。這種比較包含了(1)江南兩個最重要的輕工業部門（棉紡織業、絲織業）的生產規模（指從業人數、生產總量兩方面）都遠超過英國。(2)明清江南也和英國一樣，在原料來源及產品市場方面，都是與外貿有關的部門發展得較快。但是(3)江南重工業的發展明顯較英國遲緩，尤其以礦冶業差距最顯著。(4)英國工農業生產動力以水力、畜力為主，人力比重愈來愈小，燃料用煤愈加吃重；明清江南工業則仍以人力為基礎，燃料以炭、薪、蘆葦為主；至於木材和鐵的消耗，江南更難望英國項背。

作者強調，形成明清江南「節能省材」型工業的原因，在於資源（能源和材料）供應不足，這使得與煤鐵有關的工業部門因此發展遲緩。江南缺乏煤鐵資源，亦缺乏重工業發展所需的其他主要自然資源（水力、其他金屬礦藏）。反之，對能源和材料需求相對較少的輕工業則可以獨厚，特別是江南擁有數量龐大、素質高的勞動人口，有利於輕工業發展。例如，當清代中期華北、湖廣、川貴、廣東等地紡織業迅速發展起來後，江南紡織品仍能壟斷高級產品市場，以及發展奢侈品生產，都是拜高素質勞動力的有利地位所賜。

工業結構之外，作者於本章中特別針對江南的小型企業規模提出新解。過去，萌芽論者著眼於搜尋明清時期是否出現實行僱傭勞動的大生產型態，以及使用機器機械的普遍程度，將手工操作和獨立經營的小作坊，視為資本主義式生產不能順利萌芽的障礙。現在，作者則轉換視角，正面肯定小作坊手工生產形態的合理性。他認為「節能省材」型的江南工業生產，由於能源、材料的缺乏（不是

相關的技術創新精神及外來技術知識的缺乏或排斥），限制了江南工業對機器和機械的使用，加上建造大型廠房（手工工場）經常所費不貲，使企業規模傾向以較具合理性、符合江南人口資源特點的小作坊為主，反而具備了經濟上的優越性。

（七）再議江南早期工業化的「前景」

明清江南早期工業化的前景是什麼？這正是萌芽論長期以來處理的核心課題。所謂「前景」，是指由早期工業化轉為近代工業化的進程。但拋開向來只以近代工業化作為早期工業化「前景」的視角，作者認為，明清江南工業的發展動力和成長趨勢應該屬於「斯密型成長」（the Smithian Growth）。此型成長主要是由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發展所推動，而市場的擴大則增加經濟成長的機會。其成長特點在於經濟總產量及勞動生產率都有提高，但沒有出現技術突破，成長極限取決於市場規模的擴大（以江南言，市場規模尤指國內貿易）。換言之，市場容量是其發展極限。並且由於沒有技術突破，斯密型成長本來就無法導致近代工業化。因此，若無明顯外力入侵，明清江南工業的前景，就是按其趨勢繼續發展下去（斯密型成長），不會導致近代工業化，而是為後來的工業化提供良好的基礎。

最後，一如全書各章，以回應萌芽論的既有論點出發，作者於書末仍不忘為萌芽論再添一評。他肯定萌芽論的貢獻在於打破「中國停滯」、「高度平衡機括」、「中國封建社會是超穩定系統」、「衝擊——回應」諸般理論模式，重視中國自身及內部因素。但萌芽論者極力從中國歷史上找尋早期資本主義存在證據的心態，可說是自限於「資本主義萌芽情結」之中。萌芽論的理論問題在於：第一，除了以英國模式出發，來證明英國工業化的道路也在明清江南土地上重覆之外，其所持有的英國經驗的認識更是過時的（因為早期工業化不必然導致近代工業化）；第二，論者只圍繞在「惟生產關係」（生產關係為主、生產力為輔，頁528）的研究，似乎認為只要生產關係陸續演變，就會從萌芽發展為成熟的資本主義。這種看法有邏輯上的問題，亦與事實不符。作者強調，此種理論應予擺脫，並藉此脫胎之機，可與「西方中心主義」史觀劃清界線。

三、幾點省思

本書強調明清江南輕重工業部門比例上的差異，除了顯示明清江南工業屬於「節能省材」型的發展之外，也表示這種型態的發展特點實為明清江南無法有效導向近代工業化的原因。作者強調研究工業發展進程時應注意結構的重要性，也由此，作者詳細討論原料、能源、材料等物質環境與勞動力供需等，對明清江南工業發展的影響。這樣的討論內容構成本書的一大部份，也是本書最重要的特點。

其次，作者檢討了影響大陸學界甚久的萌芽論。他認為萌芽論的盲點在於，視英國模式為歷史上唯一自發性工業化成功的範例，並從這條發展道路追尋中國的足跡。因此，在方法論上，萌芽論者走的是一種西方中心論模式。本書卻是想要努力擺脫西方中心論的陰影，企圖證明十九世紀中期以前江南已邁入包含傳統農村工業在內的「早期工業化」現象，並形成「斯密型成長」式的經濟發展，因此不會如萌芽論者預示的：若無「外國」資本主義入侵，江南會邁向英國模式的道路，而是按「斯密型成長」趨勢繼續發展下去。就擺脫舊框架不必要的束縛而言，本書的努力相當值得鼓勵和肯定。

此外，書中數處由於無法獲得直接資料用以說明作者想要解決的問題，間接推論與利用相關資料加以計算的方式，在書中即為作者所運用，使無直接資料卻又重要的問題獲得另一種方式的解決。例如在重工業(二)中，關於明清時期江南造船業生產規模的擴大，即每年建造船隻的數量與噸位的增加，由於沒有直接的記載，作者利用的方式是：先了解江南所使用的各類船隻數量是多少；其次，確定其中有多少船隻是在江南製造；再次，瞭解江南各類型船隻的使用年限；復次，根據上述結果，對明清江南每年造船的數量作出估計；最後，比較各時期造船數量，觀察其變化以判別是否有成長。在這裡，不妨以下面的簡單例子，對作者的估計方式作一說明。假設江南每年製造三十噸的甲類船隻二十五艘，而這類船隻的使用年限是十年，每年製造十五噸的乙類船隻八艘，這類船隻的使用年限是五年。那麼平均每年江南製造甲類船隻的噸數是七十五噸，乙類是二十四噸，加總之後，江南每年的造船規模就是九十九噸。作者在書中亦建立合適的觀察指標，並輔以數字化的方式說明，如此可避免僅以文字表現所帶來的相對模糊，儘管凡

此均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與精神在史料的蒐集與進一步整理上。例如頁 220 至 223 中，作者對於建材的尺寸與價格即能以詳細的數字列表說明。

不過，書中涉及的諸多論點，尚留有可以再討論的空間。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對「早期工業化」一語的理解和應用，以生產部門的分劃觀察總體經濟成長的問題，以及敘述概念或推論的瑕疵。

(一)「早期工業化」——理論的理解與應用研究的檢討

作者於〈導論〉中從「原始工業化」理論出發，繼而延伸為以「早期工業化」來替代「原始工業化」，並添修部份要素，構築出作者理想中的理論內容，以此語彙含稱 1550 至 1850 年的江南工業發展，這樣的取徑曾受到高度的讚譽。⁵不過，如果我們將「早期工業化」視為可以應用的經濟史理論的話，或許應該釐清以下兩個思考點：第一，「早期工業化」一詞是否具有概括性 (generalization)，是一種專為十八世紀中期以前的工業發展階段萃煉出的表述嗎？第二，語詞原用者曾標示出「早期工業化時期」的重大特徵，這些特徵的性質，與作者所使用的「早期工業化」概念是否存在同一性？

據 Phyllis Deane 所述，首先將英國工業革命往前追溯到更早時期的是 J.U. Nef。Nef 極力證明 1540 至 1640 年間英國在採煤業和各種製造工業方面曾出現的巨大擴張，認為是一個工業快速成長的時期，且成長速度毫不遜於十八世紀中期開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即通稱的「近代工業化」）。由於這兩個時期的總發展趨勢前後延續性強，在行文中，Deane 暫稱 Nef 所強調的這個時期為「工業化的初期」（the early period of industrialization，大陸學人譯為「早期工業化」），而將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稱為「（工業化的）後期」（the latter period）。⁶這裡，Deane 同意 Nef 強調的界定，目的在於將向來以十八世紀中期做為工業革命的分界法，予以更彈性的對待。

5 宋立中、范金民，〈理論與實證相結合的一部力著——評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頁 193-195。

6 契波拉編，張彬村、林灑華譯，〈歐洲經濟史：工業社會的興起〉（台北：遠流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9），頁 174。原著：Carlo M. Cipolla ed.,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The Harvester Press Limited, 1976), Vol. 4, *The Emergence of Industrial Societies*, Part one, p.165.

然而 Deane 所分別的「初期」和「後期」有何意義？據 Nef 的研究，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發生並非忽然而有的現象，其重大特徵有更早的軌跡可循，整個工業化乃是歷經一段長時期的過程而來。所謂特徵，是指第一次工業革命所標示的兩個主要變遷，即技術進步和大規模工業的出現，其具體發展趨勢包括：工業生產由手工到動力以及由自然力（水力）到機械動力的使用、能源由木材為主到以煤炭取代、生產組織由家內式到半工廠或工廠、生產過程由小工匠之手轉為資本家雇者掌握，而技術變遷的帶動和市場的擴大使得大規模生產——工業資本的集中——得以發展，這些趨勢尤其表現在礦業、金屬、造船等製造工業方面。⁷ 在 Nef 的討論脈絡中，「後期」的主要特徵明顯延續了「初期」的發展，特別是指十八世紀中期以來現代工業部門的特徵在較早時期的出現而言。無論是「初期」或「後期」，都是以「近代工業化」具有的相似特質範圍而論，總發展趨勢都是「朝向近代工業化」。所謂初始與後來，只是程度之別，但同一性仍高。而且這只是英國的例子，其他國家在工業化以前的發展是否也具備如此特徵，不得而知。非但 Nef，即使使用「工業化的初期」（「早期工業化」）這一語稱的 Deane，也未將之當做概括十八世紀中期以前工業發展特徵特有的語稱，更未意圖建構一個適用於工業化以前時期的工業發展理論。「初期」之詞，僅僅是為了凸顯十八世紀中期以來的英國工業革命應該被視為「後期」的對稱而已。

然而在本書中，作者借用 Deane 所述「初期」與「後期」的兩種區別內容，⁸ 進一步把「工業化的初期」（「早期工業化」）一詞無形中加以範式化，儼然成爲一個可以「稱呼工業革命以前歐洲的工業化」的專有理論。（頁 13）即便如此，雖無不可，但是應該釐清的是，Deane 使用時的語稱，其含意不但

7 J. U. Nef, "The Progress of Technology and the Growth of Large-Scale Industry in Great Britain, 1540-1640,"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Edward Arnold Ltd., 1966), Volume one, pp.88-107.

8 Nef 強調「初期」與「後期」有同一性質的發展，Deane 則在 Nef 的基礎上區別其程度差異：工業化擴展得較緩慢、影響國家工業的範圍有限，工業上的技術突破相對較小；且農業產量、國內交通、國際貿易等方面的擴張並未支持到這個部門的成長，也就是說，工業化前後期最主要的差別在於企業規模和經濟機會的廣度。見契波拉編，張彬村、林灑華譯，《歐洲經濟史：工業社會的興起》，頁 175。

只限於英國、未擴大驗證於其他國家，而且與 Nef 指稱的一樣，是就現代工業部門的特徵做為立論基礎，不包括手工作坊、自然動力、家內式生產、小工匠資本等舊式生產技術和組織。反觀本書，論述的對象顯然包含農村工業（手工、家內式生產），以及 Nef 和 Deane 未予納入的傳統生產特質。例如，在第二至第六章中，作者一再企圖證明各個工業的生產規模於三百年間出現了擴大的現象。而作者所謂的「規模」，主要是指從業人員數量、機具設置數量、該項工業總產量三方面的增加，與 Nef 所說由手工到機械動力、煤炭能取代木材、由家內式到半工廠或工廠、由小工匠轉為資本案雇傭等等發展特質大為不同，實質上接近於「未近代工業化」質素，而非「朝向近代工業化」質素。可見本書「早期工業化」一語，其內涵已有相當的改變，甚至與語詞原用者的核心概念相背。因此，標以「早期工業化」似需再加斟酌。

「朝向近代工業化」質素是引用「早期工業化」一詞的關鍵概念，跟隨此一概念思考，還將牽涉到研究斷限的確認問題。本書以 1550 年為上限，主要承襲萌芽論的說法，認為明代中期經濟開始加速成長，其中工業居於最重要地位。至於下限，作者認為，江南的近代工業化肇始於清末洋務運動時期，並且在此之前江南又遭太平天國戰役嚴重波及，因而將「早期工業化」的時間下限定於戰役破壞前夕的 1850 年。（頁 23 至 24）定出這個下限的用意很清楚，作者希冀描繪出一個未受西方影響之前，由中國內部自發的工業發展面貌。以洋務運動時期作為中國近代工業化的起點，雖無太大疑慮，然而從「朝向近代工業化」的角度來審視時，一般認為，儘管十九世紀中期至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工業已可看到相當程度的成長，但是仍然未發生實質的「工業革命」。⁹ 現代工業，尤其是重工業部

9 費惟愷著，虞和平譯，《中國早期工業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 332；馬若孟，〈手工棉紡織和近代中國棉紡織工業的發展〉，收於張仲禮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論著選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頁 295；王玉茹、劉佛丁、張東剛，〈制度變遷與中國近代工業化——以政府的行為分析為中心〉（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頁 361-363、386-391。Albert Feuerwerker, "The Growth of Producer Industries, 1900-1971," in Dwight H. Perkins ed., *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205.

門，自1900年以後才有比較明顯的擴張，部門間的關聯、外貿的帶動也漸顯現效果。¹⁰而到1950年代至1970年代之際，才出現Simon Kuznets所謂的「現代經濟成長」性質的持續性經濟成長和結構變遷。¹¹因而也有學者認為，自十九世紀晚期以來，中國本土的製造工業數量雖然逐漸增加，然整體工業部門的成長較之後來時期仍然微小，處於初期工業化的時期。¹²從上述諸項研究可知，十九世紀中期至二十世紀中期，中國尚未邁向「近代工業化」，這段時期工業化擴展比後來時期緩慢、影響國家工業的範圍也有限，但卻是「朝向近代工業化」而發展，似較接近Nef和Deane所說「工業化的初期」（「早期工業化」）的特徵。據此，「早期工業化」時期的上限似應以十九世紀中期為起點，而下限則應在二十世紀中期，而作者書中所謂的「早期工業化時期」，應屬於以「未近代工業化」質素為主要特質的時期。

理論應用還關涉到是否意圖檢驗理論的問題，茲以書中的人口議題為例來討論。在人力資源一章中，姑且不論作者的推證數據是否合理，以英國為參照是否合宜，¹³雖然條條論述都企圖導向江南人口的增加並未達到「人口過剩」的地步，我們似乎無法知道當作者以「早期工業化」概念應用到江南區域時，理論本身指涉的人口特徵，與江南的人口特徵有何相似性（或差異）。事實上由作者所借用且僅僅粗略勾勒的「早期工業化」特徵，（頁13）並沒有包含人口一項。

10 Thomas G. Rawski 對二十世紀上半期的中國經濟成長比較樂觀，見Rawski, *China's Transition to Industrialism: Producer Good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n Arbor,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0), pp.2, 82-89, 146-147. Thomas G. Rawski,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Berkeley,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116-119, 344-351.

11 這是Perkins的看法，Kuznets（台灣譯名顧志耐）本人的分析並不包括共產國家在內，他認為共產國家由獨裁統治所形成的獨特的經濟體系，很難與自由經濟活動的經濟體系國家做比較。見Dwight H. Perkins "Growth and Changing Structure of China's Twentieth-Century Economy," in Dwight H. Perkins ed., *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p.128, 130, 131, 138, 147. 庫茨內斯（Simon Kuznets）著，林山木譯，《現代經濟成長》（台北：今日世界出版社，1979），頁147。

12 Albert Feuerwerker, *The Chinese Economy, ca. 1870-1911* (Ann Arbor,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69),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No.5, p.36.

13 由於以英國為參照，作者認為1620-1850年間江南沒有出現「人口爆炸」。這種比較無可厚非，但是人口是否成長過快或形成壓力，如不將人口成長率與經濟成長率相衡的話，勢難斷論。不過，如何估計1620~1850年江南的經濟成長率，則是另一難題。

從另一角度思考，無論是應用「原始工業化」理論或「早期工業化」概念，此處「江南型」的「早期工業化」時期人口變化特徵，與以「英國型」（或其他已實證地區）為範式的早期工業化人口特徵相衡之後，是否有益於理論修正的進行？據 Mendels 的總結，歷經「原始工業化」的地區，其人口特徵主要在於結婚年齡下降，進而使人口增長，增加勞動力供給，（頁 8）同時還包括人口行為以外的農場規模縮小、分家制度盛行等特殊條件同時發生，以及持續擴張發展後可能導致的原料分配、產品收集、生產成本上升等困境，手工業利潤遞減等等。¹⁴ 針對此點，由作者呈現的江南人口變化特徵（人口沒有過度增加、沒有過剩的勞動力、勞動生產率未降低），雖沒有包含 Mendels 指出的這些相關變數，卻也間接回應了 Mendels 的論點，但是卻未進一步調整、豐富化所借用的「早期工業化」概念（如果將「早期工業化」視為一種理論範式的意涵的話），不知作者的顧慮何在。或許作者只願採取 Mendels 強調的「農村工業有發展」這一觀念，對於 Mendels 其他的配套論述則有意無意加以忽略，亦未可知。換句話說，此處的疑問是：本書的整體意圖，是否包含以中國的實例檢驗作者的「早期工業化」理論的可適性，並對該理論再度加以修正。或者如宋、范二人所言，從作者不斷強調各個工業幾乎都廣泛地朝向分工與專業化的論述來看，顯示作者的意圖是要呼應「斯密型成長」理論，¹⁵ 而不是回應「早期工業化」的內容。

（二）生產部門的分劃與總體經濟成長

還有，有關生產部門的分劃及其與總體經濟成長的關聯問題，也應該一提。在首章及末章中，作者說，「早期工業化」屬於「斯密型成長」，近代工業化屬於「庫茲涅茲成長」（the Kuznetsian Growth），（頁 14）又說「早期工業化向近代工業化轉變的實質，是社會生產兩大部類比例關係發生重大改變，即生產資料迅速擴大（表現為重工業快速成長），……」云云。（頁 522）作者所謂「社

14 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頁 36-37、40、41；石錦，《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收於石著，《中國近代社會研究》（台北：李敖出版社，1990），頁 113。

15 宋立中、范金民，《理論與實證相結合的一部力作——評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頁 200。

會生產兩大部類」分別指「生產資料」（重工業）、「生活資料」（輕工業）（頁27），而其所謂「早期工業化向近代工業化轉變」，主要強調重工業部門愈來愈擴張的演變趨勢。重工業的擴張的確是歐洲國家近代工業化過程中很顯著的一個變化，但是在 Kuznets 的理論當中，「現代經濟成長」並非狹隘地囿於重工業部門，而是就現代化生產部門來衡量；並且一般所說的「工業化過程」是指社會結構由農業生產發展為非農業生產（但並不意謂農業部門不與新興技術和改革發生關聯）。¹⁶ 也就是說，「庫茲涅茲成長」是以農業、工業、服務業三個部門的相對關係的變化，來看部門之內及部門之間的結構變遷，當人口和國民平均生產量兩者都持續而大幅增加時，即發生「現代經濟成長」；若發展充分，其結構變遷是由農業轉變為工業、工業中的製造業在工業生產額漸有增加、服務業的勞動比重上升。¹⁷

這樣看來，本書作者以「近代工業化」歸於「庫茲涅茲成長」時，顯然過於簡化 Kuznets 「經濟成長」的含義，而且太過侷限於重工業一項，忽略了其他要素。尤其 Kuznets 提過，現代經濟時代的重大改變是廣用科學解決經濟問題，因而可將之稱為科學時代。¹⁸ 西方世界的生產力、生產方式的轉變，與其科學革命的發展應用有關，李著使用「庫茲涅茲成長」論近代工業化時，並未留意此點。其次，作者所用的「生活資料」一詞實包含農業與輕工業，（頁518）當作者說「社會生產兩大部類比例關係發生重大改變」時，其實是將生產部門劃分為兩大類：(1)重工業、(2)農業與輕工業，觀察其改變。據此推導，作者所謂「早期工業化向近代工業化轉變」，則是指由農業與輕工業為主的生產，轉向以重工業為主的生產。果真如此，如何能將這樣的轉變歷程稱之為「近代工業化」？由於生產部門分劃不一致，如何說服讀者接受「近代工業化屬於庫茲涅茲成長」，尚待論證。

16 庫茨內斯(Simon Kuznets)著，林山木譯，《現代經濟成長》，頁1、5、14。

17 庫茨內斯(Simon Kuznets)著，林山木譯，《現代經濟成長》，頁11、18、37-39、51-54、56-60、149-150。

18 庫茨內斯(Simon Kuznets)著，林山木譯，《現代經濟成長》，頁5。

（三）敘述概念或推論的瑕疵

這方面的問題，宋、范一文已多所陳述，不過本文還可以再舉數處加以補充。以人力資源一章為例，首先是勞動力數量的估計，雖然作者把經由城市化水平、個體家庭數、每戶由一夫一婦勞動等條件所估出的數量性質，稱為「工業中的勞動力」，然而這種計法事實上無法專指工業從業人員，而是泛指所有在城及在鄉的已成家勞動者。另外，作者以更為勞動密集的農制在江南不能推行成功，表明江南勞動力供給不足。此處或許是過度推論了。勞動更密集的農制在江南難以推行，應是顯示以江南既有的勞動力負擔既有的農制並沒有不足，而不是勞動供給不足。這在談及勞動力素質時也有類似的情形，以致結論略顯空疏。例如：原本欲以科舉入仕不果，轉謀幕僚、訟師、賬房、書辦等等生計的一群菁英教育出身的人力，作者視為「為江南工業的發展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受過較高教育的人力」。（頁449）問題是，這些受高教育的士子（或下層士人）如何為工業生產做準備？兩者的關聯何在？又如：書中詳細臚列江南眾多有名的技術專家和發明家，同樣的問題是，在文脈中看不到論證技術人才與工業發展之間的關係。雖然作者也不否認這點，卻仍然主張「明清江南在培養和造就工業發展所需的高級技術人才的方面，是頗有成就的」。（頁453）

經由本文的討論，雖然我們對本書論點仍有以上幾點質疑，但不可否認的，誠如宋、范二人所云，作者對西方相關理論的反省並嘗試將之運用於中國研究、以及在史料蒐集上所做的種種努力，使得本書在中國工業化的相關研究已經十分豐富的情況下，依然值得肯定與重視。尤其對於思考西式工業體制移入之前，中國本有的工業部門的特性和發展，本書確實提供了另一種分析及解釋的可能途徑。